

英語帝國的解構與再建構： 網際網路全球化時代的語言文化政治

張月珍

一·前言

Crystal(1996)在《<<英語之為全球語言>>(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一書指出，當今英語不僅是英語國家如英，美，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南非等國家的母語，也成為世界上七十幾個國家的官方語言，同時，包括中國等有超過一百個國家選擇英語為優先學習的外語。依他的估計，在1990年代末期，全球有將近四分之一的人口(亦即12億至15億人)已經能使用流利的或合理的英語，同時這樣的數字還會持續增加(p. 4-5)。英語的發展，當然如Crystal所言有其歷史，文化與政治，經濟因素。英語之所以如此快速的擴張，無可諱言地，和十九世紀英國殖民帝國主義在世界各地肆虐，推展其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各方面的帝國版圖及二十世紀美國的強盛有著直接及深遠的關係。英語的霸權地位和英語國家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所佔據的中心地位也絕對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二十世紀，由美國為首所主導的全球權力關係及架構下，英語成為國際間重要科技經貿學術會議，政治外交協商，政府書信往返，學術論文出版發表，商業溝通的主要語言；英語也成為國際人民間最被普遍使用於一般旅遊，日常會話溝通的共通語言。此外，英語語言符號被廣泛挪用，進入各國的語言符號系統中，為人類語言生態，文化內涵產生一定的影響。

然而，或許從來沒有一種語言能像英語一樣，在人類語言發展史上扮演如此重要但又引人爭議的角色。從十九世紀做為傳播帝國政策，力行壓迫思想的工具，英語被譏為帝國主義式語言(an imperialist language)，到二十世紀，因國際間人際互動的頻繁，英語成為地球上人們普遍選擇使用於溝通的共通語(lingua franca)

或 Crystal 所稱的全球語 (global language)，英語的支配性 (dominant)，霸權 (hegemonic) 地位似乎屹立不搖；英語所獨享的權力與地位除已式微的拉丁語，法語，德語外，實非其他語言可匹敵。或許無論是以具威迫性，壓制性，剝削性意涵的帝國主義式語言形容英語，或以葛蘭西霸權的觀念來解讀英語的地位，都無法磨滅英語在這二個世紀裡，在非英語世界 (包括曾被英國殖民統治及未統治過的國家) 所形成的漣漪，但是隨英語傳播所形成的英語語言及文化侵略，對非英語系國家所造成的心理衝擊與文化認同影響是難以漠視的。二十世紀晚期，各國為因應「國際化」，「全球化」發展，相繼推薦制定相關英語語言政策，語言學家也思考英語的未來及可能有的變化。「英語帝國」似乎持續壯大，而全球英語弱勢國家在依附仰賴英語之際，應有何省思與態度，以不落入被英語語言帝國文化收編的窘境，或許從解讀英語傳播背後的諸多作用力及從曾遭英語殖民統治的後殖民國家 (即普遍仍以英語為第二語言 (L2) 的國家) 和英語的關係出發觀照，透視語言政策背後的權力支配治理關係，可以給予我們在積極推動以英語為主要外國語言的語言政策及從事英語教學工作時某些省思。

二·英語的傳播與語言帝國主義

自從英語做為殖民帝國者壓迫的工具，英語語言的工具性及功能性一直是被操弄的。從十九世紀英國殖民帝國拓展到英語殖民國家於 1940 年代以後紛紛宣布獨立，英語持續在世界語言版圖上不斷擴大。在語言家眼中，英語之所以享有其支配性霸權地位，固然和十九世紀英國帝國雄威，以及二次大戰後美國在世界上政治，經濟，科技各方面舉足輕重的領袖地位有關，不過，環繞或隱藏於英語傳播及英語教學周邊的政治，文化，倫理問題才可能更值得注意 (Pennycook, 1994, p.5)。換言之，當英語一直被視為是一項工具 (tool)，手段 (means) 被學習與不斷傳播時，藉由此手段所欲達到的目的 (ends) 似乎更需被探討。

學者在探討英語傳播現象時，有從語言帝國主義 (linguistic imperialism) 角度探討，有從文化政治角度切入，而其目的無不在解除英語帝國主義者建構英語為強勢語言的迷思。首先對英語支

配霸權深刻提出省察與批判的是丹麥學者Robert Phillipson。在《<語言帝國主義>>(1992)一書中，Phillipson不僅探討英語傳播的原因，解構英語權力和英國英語教學(ETL)間糾葛的政治關係，並深入分析了第三世界英語教學和英語傳播間的共謀關係。他對英語國家以援助第三世界開發中國家的語言教學之計畫為手段，一味輸出英語國之意識形態，而忽略第三世界對英語的真正需求，提出深刻的檢驗。在挪用福柯(Foucault)權力及安德生(Anderson)想像社群的觀念後，Phillipson聲稱英語社群是被想像建構而成，英語的優勢性也是在眾多爭取主導性語言階層中，透過不斷強調英語的主導性，經由想像建構鞏固其地位(p. 272-3)。他指出，維持英語勢力於不墜的一個原因是英語國家掌握了豐富的物質的(material)與非物質的(immateral)方面的資源，這包括英語師資，教材，單一英語工具書籍(monolingual dictionary)，英語知識，教學方法與技術。英語國家在其殖民領地，宣揚純粹標準英語，強調透過單一英語學習英語的必要性，壓縮了雙語或多種語言存在的空間，使其他語言失去與英語競爭成為支配語的機會，因而鞏固英語結構性的權力(p. 277-9)。

英語的優勢地位無疑是建構的結果，在英國殖民時期，其建構的策略通常是殖民者利用限定只能有少數精英能接受英語教育的語言教育政策，壟斷教育資源，剝奪其他勞工階級學習英語的機會，防堵非精英份子在社會向上攀升的流動性，因為唯有以如此的語言教育政策才能維持社會階級的穩定，保證被殖民者勞力供應的不匱乏(Clayton, 1999, p. 148)。英語因此被利用為壟斷殖民者資源，剝削被殖民者勞力的工具。澳洲語言學者Alastair Pennycook(1994; 1998)也在解除英語為國際語言迷思的研究中，曾相繼從文化政治，國際關係理論及殖民論述角度來分析並論證英語之被論述建構成優勢語言的現象。他從殖民者用降服馴化被殖民者的二元對立觀點--自我/他者，文明/野蠻，優/劣--來分析英語之得以維持其優越性，持續傳播的原因。他認為自十九世紀至今，英語語言政策和殖民論述與殖民意識形態間保持者親密的關係。英語是製造和反映殖民意識形態的場所。因為英語所代表的是「文明，理性，進步，現代」，所以它被認為是能帶給英

的關係。英語是製造和反映殖民意識形態的場所。因為英語所代表的是「文明，理性，進步，現代」，所以它被認為是能帶給英語帝國殖民地人民「文明，知識，財富」的工具(1998, p. 4-5)。二次世界大戰後，英語及教育的援外計畫也是建立在已開發國家是「進步，現代」的假設上。像Phillipson一樣，Pennycook(1994)也將矛頭指向英語國家教育援外計畫，不過，他從國際關係，外交政策角度，更深入檢驗語文教育被西方開發國家利用於推廣其現代化模式。冷戰期間，已開發國家認為教育是帶動一個國家進步發展的主要力量，所以積極透過援助性教育計畫課程，協助未開發國家發展，以邁向現代化，接受西方現代化價值，資本主義模式，但是已開發國家以宣揚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教育計畫，非但未能對其協助的國家帶來公平社會，反而因強調現代，犧牲傳統，重視資本主義，深化社會的不平等，複製西方知識，使未開發國家的大學只是西方知識的消費場所(p. 42-9)。

由於有關英語的論述中，總將英語和進步，繁榮，成功畫上等號，當代各國的語言政策便在這追求進步的需求中，決定了英語的功能性地位，而這也為英語國家能不斷輸出英語教師，提倡英語語言專業訓練及教學找到合法性的地位(Phillipson, p. 8)。英語教學工作被組織化，機構化，其目的之一是為援外服務，由此，透過對外的語言援助計畫，英語國家得以迅速傳播推廣其「國家」語言，但是將英語商品化卻是英語國家之所以能不斷在市場上持續銷售其語言，吸引消費的另一個原因。換言之，當英語被英語資本主義國家包裝成為世界性的商品(English as a world commodity)，在世界各地以各種形式被販賣時，英語的語言版圖和相關企業就在「需求與供應」的商業消費模式中找到不斷擴大的機會。仔細觀之，英語文教學出版者在世界各地所發揮的行銷政策與手法的確是將英語成功推向世界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編著者，出版商，教材代理商，教學者，語言機構長期以來形成了相當緊密的共謀利益網絡。英語國家以其語文為最大資本，不斷經由出版商業體系依市場需求進行包裝製造，非英語國家英語學習者成為最大宗的消費群。和其他學科領域相比較，恐怕沒有一門學科的學習教材能像英語文教材如此繁複，零亂，炫人耳目。

編寫者可以依各種不同的需要，程度，內容，背景，年齡及地區，撰寫出版五花八門的教材，而似乎沒有一種教材能真正成功地符合或滿足教授者與學習者的需求。此外，為因應市場需求或協助學習者通過英語國家所訂定的語言考試要求門檻(如托福測驗等)，各種在非英語國家私人設立的英語語言教育機構成為另一個吸納英語師資，傳銷流通英語的商業機制。臺灣滿街林立，良莠不齊的英美語補習機構，在學習者尋求英語致勝的萬靈丹或舒解其在正規學制中英語學習所遭遇的焦慮與挫敗感的過程中，扮演了相當的角色。學習者在渴望能駕馭這項普遍認為可以協助他們通向所謂成功之路，提升其社經地位的語言工具，皆投資不菲，間接穩定了英語文資本市場的地位。

三．後殖民時代對英語霸權的抗拒與擁抱

第三世界後殖民國家人民對英語系殖民者的語言所展現的既抗拒又擁抱的矛盾情結是殖民及後殖民論述中常見討論的議題。在英國殖民帝國時代，語言是殖民者用以遂行其剝削及消滅被殖民者語言與文化的一種工具。透過強制推行殖民者所使用的單一語言教育政策，殖民者以最直接的方式傳佈其意識形態，控制被殖民者之思想，令其臣服。殖民者施展其政治權力，將英語制定為官方語言，賦予其極高的地位，舉凡教育，司法，政令宣導皆以英語為溝通工具，殖民地人民或被剝奪及或被壓縮接觸傳承其母語的機會。地方語言被禁止或嘲弄，相反地，英語做為帝國的語言卻一直是優勢，權貴，經濟地位，社會階級及身份的象徵，是殖民者擁有的最大文化資本。因此，對被殖民者而言，學習英語，挪用英語，駕馭英語具有相當的社會指標意義及政治文化意涵。透過教育有效接觸，學習駕馭殖民者所使用的語言，是被殖民者尋求納入(integrate)主流殖民社會，獲得認同的途徑，同時也是其尋求分享殖民者之資本，逆轉經濟處境，攀升至較高社會階級，取得權力(empowering)的方法。諷刺的是，這樣地位的提升，所意味的是被殖民者在努力達到殖民「母國」的文化標準，語言掌握之際，逐步捨棄了法農(1967)所謂的「叢林」，「本土」文化(p. 18)。除此之外，語言殖民對被殖民者心理及身份認同上

提升，所意味的是被殖民者在努力達到殖民「母國」的文化標準，語言掌握之際，逐步捨棄了法農(1967)所謂的「叢林」，「本土」文化(p. 18)。除此之外，語言殖民對被殖民者心理及身份認同上也造成相當的傷害。法農著名的<<黑皮膚、白面具>>(1967)書中第一章中，即深刻地分析無法使用純正殖民者語言的被殖民者如何被矮化為孩童以待，而那些接受歐洲殖民者宗主國教育，自殖民母國歸來屬精英階級的非洲黑人，如何藉使用殖民者的語言炫耀自我成就，企求能與殖民者平起平坐的自卑情結，雙重意識(double consciousness)及隱藏於心中語言文化疏離的現象(p. 25)。

為降低這心理異化(alienation)的痛楚，對殖民語言的挑戰一直是被殖民國家抗拒殖民者統治的主軸策略之一。雖然被殖民者所採用的抗拒策略有所不同，但所想達到挑戰標準殖民語言及其標準規範所形成的價值，鬆動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因語言差異所產生的權力，階級關係，彰顯自身語言及文化主體性的目標卻相當明顯。在文學表現上，非洲作家如Ngugi wa Thiongo，以排斥揚棄帝國文化，語言，美學標準，重拾母語，「逆向書寫帝國」，表現其認同本土語言文化之決心。其他則是在挪用(appropriate)殖民者語言時，以非標準化的英語為手段，彰顯其自我國族身份，挑釁，抗拒，顛覆殖民者中心霸權的語言，展現其在邊緣挑釁解構英語帝國的企圖(Ascroft, 1986)。

1940至1990年間，世界上有將近一百個殖民地脫離殖民者獨立，其中有56個英屬殖民地(Fishman 1996:5)。然而。英語帝國政治權力的瓦解並未帶來英語語言權力的衰微。在脫離殖民統治後，許多後殖民國家在語言的選擇上面臨相當的矛盾。二十世紀末葉，一些後殖民國家，或Fishman(1996)所稱之為後帝國(post-imperial)的英語國家(如墨西哥，菲律賓，印度，新加坡，馬來西亞，奈及利亞，肯亞，南非等)，在經濟，貿易，科技各方面仍處世界體系的邊陲，然卻陷入所謂世界經濟體系的框架中，必須依賴已開發的國家協助，所以，在與以美國為首的資本資訊霸權中心國家的互動之間，常不得不選擇，挪用或延續過去英語殖民者的語言，期能藉此媒介工具更有效地掌握並保持與英語國家

求建立新加坡人的自我文化認同，遂倡導傳統中國儒家重視家庭的倫理觀，同時，不斷強調英語只是與西方溝通的媒介，是促進新加坡國家邁向现代化的工具，希望藉此去除英語的政治性 (depoliticize English)，然而，縱使如此的呼籲也未能去除英語權力在社會的滲透，擴張，影響人民潛在對英語語言的愛恨情結。由於在新加坡多種族與多語言的社會中，一個人的社經地位的高低相當部分取決於英語語言能力的強弱，但在文化的維繫與認同上又強調母語 (mother tongue) 的地位與角色，這非但使得未能有機會接受完整英語教育的人，在社會競爭中處於不利的地位，使得階級不平等的現象因英語為官方及教育語言而深化，也使得人民在國家認同上產生迷惘 (Pennycook, 1994, p. 245-257)。

四·英語，資本主義，全球經濟，網際網路與語言文化侵略疑慮

總而觀之，英語在英國殖民帝國時代實在兼具了帝國 (imperial) 宰制與實質經驗實用的性質。離開政治殖民時代，英語還是環繞在「融合論述」 (integrative discourse) 與「權力論述」 (empowering discourse) 之間，一方面它被視為是開啓人們進入國際貿易，科技，旅遊，科學的鑰匙，另一方面也被認為是權力結構不平衡狀態中的意識形態工具 (Warschauer, 2000)。有關英語的論述總是和功用論 (pragmatism)，世界體系 (world system)，國際主義 (internationalism) 結合在一起，但是 Phillipson 從 Immanuel Wallerstein 所謂世界體系理論，中心/邊陲國家的觀念著眼，解構了核心國家的計劃性語言政策與計畫，認為「在邊陲國家教育中，核心語言的地位是核心國家有意圖的計畫所形成，由此以加速邊陲國家的真實與象徵性資本流向核心國」 (Clayton, 1999, p. 153)，英語被批判成語言帝國主義的代表。另外，隱含在英語是所謂「國際」語言內的不平等關係也遭質疑 (Pennycook, 1994)。

國際間因知識，文化，資本分散流動的不平均的現象，對政治經濟弱勢國家所造成的衝擊早引起注意討論。學者批評1960年代起，西方憑其科技經濟強勢，向外推展其資本主義現代性 (capitalist modernity) 之神話，其實就是一種文化帝國主義 (Tomlinson, 1999, p. 80; 1991, p. 173-6)。「帝國主義」，依

治經濟弱勢國家所造成的衝擊早引起注意討論。學者批評1960年代起，西方憑其科技經濟強勢，向外推展其資本主義現代性(capitalist modernity)之神話，其實就是一種文化帝國主義(Tomlinson, 1999, p. 80; 1991, p. 173-6)。「帝國主義」，依Tomlinson (1991)的說法，「是一種有目的的計畫，刻意要把某種社會制度從權力核心傳向全球」(p. 175)。即以美國資本主義對外拓展市場為例，英/美語及其文化被商品化，其媒體(電視影音節目，MTV，廣告流行看板等)挾帶著簡單英語的商品符號，如McDonald，Levis，Coca-Cola，無孔不入的從核心國家流向邊緣第三世界國家，邊緣國家被動的承接核心國家訊息，面對所謂資本主義現代性的諸多樣貌，雖然權力中心國家並無進行任何實際文化威迫(coercion)的過程，但是卻造成邊緣國家文化的流失(Tomlinson, 1991, p. 173)。

文化帝國主義早已令各國捍衛本土文化人士憂心。1980年代資訊工業在北美大陸快速發展，電腦，傳真機，衛星通訊，視訊傳播工具的出現縮短了人類的距離，加速了全球化的過程；電子科技不斷更新出現，跨國企業挾帶其龐大資本，在世界各地建立其企業據點，資本的流通所帶動的無國界式的經濟活動，商品流通，使人無法不正視全球化與全球經濟現象成形，與夾帶於全球化過程中，因某一語言文化強勢所形成的語言文化侵略，間接造成全球文化同質性增高，而某些本土特殊文化日漸流失的現象。1990年代末葉網際網路的興起，電子郵件的傳遞，電子商務的推展成爲推動英語成爲全球主導語言的力量。由於初期資訊程式設計，軟硬體研發所使用的語言多爲英語，使用者唯有透過對英語的掌握，才可以肆意的進出以英語所呈現及架設的網站，擷取資訊，在虛擬情境中，跨越國界，進行文化間的溝通(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時間與空間距離急遽壓縮下，網路兩端的步調迅速同一。網際網路溝通爲全球擁有足夠進入網路世界設備與能力的人，建構出看似平等的烏托邦世界。然而，在這強調平等及知識分享的理想，卻因使用者貧富，階級，語言，文化及科技能力及擁有狀況而顯現差異。富有，菁英，熟悉英語，具備網路科技知識與工具設備者顯然佔據優勢，能在網路空間中掌握相對

體系(world economy system)或全球經濟(global economy)將隨資訊溝通全球化而建立。在沒有任何單一的國家可以自外於全球經濟的認知下，為整合全球性經貿發展的國際性組織，包括GATT(關稅貿易協定,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WTO (世界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等相繼成立(Yearley, 1996, p. 8)。在追求經貿發展，提昇國家競爭力的期待下，一些仰賴經貿為生存命脈的國家，認為參與此全球性組織是國家發展無可逃避，必然要走的道路。但因跨國際經貿互動需求所形成的是客觀現實的全球化現象，是有別於對全球化主觀的認知(Yearley, 1996, p. 1)。全球一體感產生的因素是時間空間距離的縮短，以及人們在地球上，所到之處，接觸到相同的物品與文化。當接觸到相同的物品與文化越多，人越能強烈感受到人是全球的一份子(Yearley, 1996, p. 9)。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個人和全人類同時居住在同一個地球上，同步過著相類似的生活，接受相類似的資訊與流行。依據羅伯森(Roland Robertson)的說法，這是人主觀意識上，將世界壓縮(compress)，所產生的一種全球一體感(global oneness)(1992, p. 8)。

經由網際網路發展，跨國企業投資，移民，旅遊所創造出的諸多面向全球化的表象，在反全球化的學者眼中卻是一種迷思甚至夢魘。他們認為諸如世界貿易組織的成立，只是跨國資本家為滿足其逼迫邊陲國家(peripheral countries)開放市場，以進行其對全球市場掌控的一種手段，這是假全球經濟發展之名所呈現出的另一種形式的帝國主義。有人更直指那是來壯大美國霸權，進行文化侵略的策略(Ferkiss, p. 2-3; Tomlinson, 1999, p. 80)。全球化是否意味美國化固然是見仁見智的問題，但是，全球化和英語總被緊密的聯繫在一起，似乎要帶動國家全球化，就需要英語，但是，到底是良善的全球化(benign globalization)趨勢加速了非英語國家人士對英語的需求與英語的傳播，還是帝國主義式的語言霸權迫使想進入全球體系的人士屈服，這是不易釐清的問題。但自1990年代後工業社會所意識到的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通訊網路發展快速，使各國體會到經由各種媒介取得資訊，統整為知識，有效運用於經濟發展，產業提升，以投入全球經濟競爭，取得優

但是，到底是良善的全球化(benign globalization)趨勢加速了非英語國家人士對英語的需求與英語的傳播，還是帝國主義式的語言霸權迫使想進入全球體系的人士屈服，這是不易釐清的問題。但自1990年代後工業社會所意識到的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通訊網路發展快速，使各國體會到經由各種媒介取得資訊，統整為知識，有效運用於經濟發展，產業提升，以投入全球經濟競爭，取得優勢的重要性(蔡宏明, 2000)。在強調知識經濟與參與全球經濟體系的重要性下，英語似乎成為知識經濟時代所強調的一項基本技術。許多非英語系國家的企業將欲進入其企業體工作的員工的英語語言駕馭能力列為必要能力，也期待政府在人才的培育上應以英語語言的教育做為基礎建設。隨跨國企業活動，網路發展，旅遊，科技國際競爭等需求下，英語的實用工具性價值不斷升高。

為因應這一波全球化所帶來的「英語帝國」再現，非英語國家的菁英份子，政策決定者，無論是否因其體察到跨國界人民接觸頻繁，對共通語言的需求，或為了追隨(或超越)以美國所領導的科技，知識與經濟霸業，無不主張應當加強人民的英語能力，以使其能直接以英語和國際人士溝通，能被納入全球資本經濟的體系。亞洲非英語系國家認為，英語能力的提昇對其人民瞭解全球事務，取得全球資源絕對有利益。2000年，日本首相小淵惠三更主張未來日本應該考慮以英語為第二官方語言，可是，這樣為迎向全球時代與全球視野對英語的擁抱，引發相當反對的聲浪，許多日本社會語言學家認為沒有必要人人學英語，並認為過早英語學習會帶來日本孩子在文化認同上的困擾(Asiaweek, 2000, p. 1)。日本學者Yukio Tsuda (1994) 在談論英語的霸權為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及全球主義(globalism)時，已指陳唯英語宰制，可能造成英語國家人士和非英語國家人士間語言及溝通的不平等，使會說英語的母語人士以其語言上的優越感，對會說英語的非母語人士及不會英語的人士產生刻板印象，岐視及偏見，間接造成非英語國家人士思考意識被殖民的感覺，並因英語的流利度形成「國際溝通的階級結構」。同時，他也認為，英語主宰的全球化形同全球文化英美化，社會麥當勞化，商業化。這樣的批判其實清楚地道出非英語國家的語言焦慮及極力想掙脫英語及英

語言的印象不斷地被繁衍與增強。和英語相關的教材，教育課程，師資培育訓練計畫再度成爲英語國家在本土吸引非英語系國家採購的商品，也是其向海外推銷的主要輸出品。語言是文化的一環，亦如巴赫汀所言承載著意識形態。英語的傳播顯然助長了經濟資本主義及全球文化的開拓，成爲強化全球意識的工具。隨語言輸出的是英語世界的文化，資本主義思想，價值觀與意識形態。由英語世界所編寫的教材(包括教科書，錄音影帶)多以英語中心的觀點出發，未能顧及非英語與英語世界間存在的文化，價值觀等諸多差異。被動接收英語教育的非英語世界教育者雖呼籲要重視本土的文化，應以英語爲工具撰寫以本土爲情境背景的教材，然而，在相對比例中，顧及本土的英語教材仍居少數。因此，如何從本土文化觀點，打破英語文化中心思想，尋求雙向語言文化平行平衡的發展與呈現，似乎是介入英語傳播者必須考量的。

英語隨著美國資本主義商品，文化，媒體傳播所產生的語言入侵，令非英語系國家如歐洲等先進國家擔心，因此，有些國家政府(尤其是法國，瑞士，波蘭，德國等歐洲國家)或主張或考慮制定保護本國語的政策，以圍堵及防止英語語言的侵入。例如，法國以各項法令規定廣告，手冊，標籤必須以法語呈現，法國電台所播放的歌曲必須有百分之四十是法語歌(Daley, 2001)。但更多的非英語系國家將矛頭指向網路傳播的英語，他們指出網路時代英語的傳播就是另一波的語言帝國主義。網路英語的傳播引起各國維護本國語言純粹性的人士憂慮，他們擔心本國語言會遭受在無國界，四處流竄的英語的干擾與污染，所以主張採取行動抗拒抵制，如法國有所謂的語言看守狗(language watchdogs)，即負責隨時檢舉在法國只以單一英語發表的網頁(Nelson, 1997)。此外，也有人反對在網路空間中肆意的以英語散播思想，並批判網路英語(cyber-english)所挾帶的負面威力。他們認爲網路英語的面貌有別於口語溝通英語，能跨越國界，使用者在鍵盤指令傳輸間，自由發表意見，傳播思想，使網路英語儼然成爲「意識形態自由市場的傳輸帶」(Lockard, 1996, p. 1)。如Lockard所嚴厲批判指出，網路英語像商品一般在無國界的自由市場流通，使必須倚賴英語發表，出版的(非)英語人士在極短時間內能找尋到改進其英語的機

隨時檢舉在法國只以單一英語發表的網頁(Nelson, 1997)。此外，也有人反對在網路空間中肆意的以英語散播思想，並批判網路英語(cyber-english)所挾帶的負面威力。他們認為網路英語的面貌有別於口語溝通英語，能跨越國界，使用者在鍵盤指令傳輸間，自由發表意見，傳播思想，使網路英語儼然成爲「意識形態自由市場的傳輸帶」(Lockard, 1996, p. 1)。如Lockard所嚴厲批判指出，網路英語像商品一般在無國界的自由市場流通，使必須倚賴英語發表，出版的(非)英語人士在極短時間內能找尋到改進其英語的機構，潤飾其成品，最後以英語人士的寫作水準出版。網路上的英語商品化的情形，彷彿語言在工廠的分配帶上，經過分層加工改造後，在網路成品市場流動，然而，要進入將英語流通銷售的先決條件當然是銷售者具備英語知識資本，知道如何製造英語商品，將英語輸入鍵盤，參與英語商品化的活動(p. 3-4)。

在英語主導的網路活動中，英語能力的強弱似乎扮演著決勝的角色。在網路空間，舉凡密碼的設定，網址的命名，文件內容的書寫傳遞絕大多數都以英語呈現。英語能力強者能宰制網上新聞的傳步，盤據討論的場域，主控遊戲規則。網路所提供的主要的功能之一應該是網路使用者能自由自在地進行討論與對話活動，然而，當英語成爲主要的網路溝通語言時，使用者對英語語言字彙，語法，語義的掌握能力成爲溝通是否能成功及愉悅的關鍵條件之一。依據Lockard所說，非英語系國家的人，常因在網路上使用非標準化，劣質的英語而遭到更正，訕笑與歧視(p. 5)。當然，非英語系人士因英語語言表達書寫能力的相對弱勢，在虛擬世界中承受如此的遭遇其實是和在真實世界所經歷並不相上下。但是網際網路資訊的開發，使資訊科技原本落後，經濟條件差，無法擔負硬體設施使用網路資訊的國家感到孤立，突顯了原本存在於國家間科技技術能力的差距及資訊取得能力的高低。倘若網路資訊的設計再以英語爲流通工具，這對非英語國家而言，無非是科技霸權之外的另一種語言壓迫。它方面，這也是形成資訊，語言，技術資本壟斷與集中的另一種手段，因爲，英語國家利用其語言權力構築了另一項障礙，阻撓非英語國家與其競爭的籌碼，相對地，鞏固了英語國家或英語能力強者在網路的權力，維

Pennycook(1994) 所駁斥的，英語之成爲普遍國際性溝通的語言，並非自然形成，英語本身所挾帶的文化政治，意識形態證明英語並非中性的語言，同時英語如此的發展也並不一定嘉惠所有的人(p. 12)。Crystal(1996)雖曾從歷史背景，文化等角度追溯英語之所以爲全球性的語言的原因，他的解說似乎爲英語躍升爲全球語言的合理性與合法性找到緣由。雖然他指出以英語爲全球語言所可能帶來的包括英語人士自滿於語言的優勢，不屑於學習其他語言，而某些弱勢語言將面臨滅絕等危機(p. 15-20)，但是，他似乎未能深刻指正出英語壯大背後全球化現象所可能形成的地區發展不均衡的現象。許多社會語言學者都憂心的指出，獨尊單一英語不僅會造成另一波語言帝國主義或語言的新殖民主義，同時也可能帶來全球包括語言生態等各方面不平衡的發展。

Phillipson(1992)，Fishman (2000)相繼指出以英語語言及文化爲中心，在全球所可能帶來的結構及文化不平等的現象。的確，由於英語的獨霸，全球重要資訊以英語傳播，重要的學術著作，醫學發現，科技突破，創新與發明也必須以英語發表才獲得認可，無形中使非英語系國家的國家語言被邊緣化，地方性方言被二度邊緣化，思想表達語言和論述空間也被極度壓縮。換言之，當英語弱勢國家或族群必須以英語再現其文化，演譯其論述時，其論述很可能受到英語語言的約制，無法暢快發聲，使得論述被「稀釋」(Tomlinson, 1991, p. 9)。長期處於英語語言弱勢的邊陲國家和英語強勢的中心國家間，因語言，學術，經濟各方面不平等的發展，拉大彼此差距的可能性勢必增加。因此，當英語弱勢國家自覺無法像英語國家自由順暢無誤地將本國的文化，經濟，政治各方面資訊藉助網際網路之便，以本國語言傳遞到全球各地被接受，而必須被動承接來自於全球各地以英語傳遞的訊息時，其所產生的焦慮其實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在抗拒這一波英語語言霸權，尋求語言生態平衡的過程中，Fishman, Phillipson等積極提出語言人權(linguistic human rights)的觀念，以維護語言弱勢族群使用其語言，免受歧視的權力。顯然，這英語全球化趨勢所造成的正面衝擊之一是各國人民開使擔心本國語言萎縮，在抗拒單一語言文化獨霸的心理下，爲尋求國

發展，拉大彼此差距的可能性勢必增加。因此，當英語弱勢國家自覺無法像英語國家自由順暢無誤地將本國的文化，經濟，政治各方面資訊藉助網際網路之便，以本國語言傳遞到全球各地被接受，而必須被動承接來自於全球各地以英語傳遞的訊息時，其所產生的焦慮其實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在抗拒這一波英語語言霸權，尋求語言生態平衡的過程中，Fishman, Phillipson等積極提出語言人權(linguistic human rights)的觀念，以維護語言弱勢族群使用其語言，免受歧視的權力。顯然，這英語全球化趨勢所造成的正面衝擊之一是各國人民開使擔心本國語言萎縮，在抗拒單一語言文化獨霸的心理下，為尋求國族文化認同，重燃起其維護本土文化及語言的強烈決心(Crystal, 1996, p. 18-19)。1990年代網路提供了語言，文化，政治弱勢族群維護其文化的途徑，比如，原住民族群得藉由架設網站，維護且傳播其傳統文化。網路界也積極研發多重語言的翻譯系統。英語系國家在面對非英語系國家的挑戰，認知必須放棄唯一英語(only English)獨尊的心態，尊重非英語國家的語言與文化的必要性，畢竟無限的跨國市場商機隱藏在其中。¹ 至於非英語系國家，為掙脫英語國家科技與語言霸權的雙重宰制早已積極研發本國語言的瀏覽器系統。1987年日本即著手研發非英語系國家語系的網上翻譯系統，其語文包括中文，印尼語，日語，馬來西亞語和泰語(Lockard, p. 12)。無論網路機器翻譯系統的成功與否，或本土語言的瀏覽器是否只是「調節性機制」，不足以成為「有效力的反霸權軟體」(Lockard, p. 12)。但至少截至目前為止，各國語言有其自成一格的語言瀏覽系統，這在某一程度營造了網際網路語言多樣性的可能面貌，降低了對英語資訊的過份依賴，遏止了以英語為中心的語言文化無止境的侵入。²

1 J.Hillis Miller 在一次談比較文學在資訊化時代，美國研究大學再全球經濟體系中將被迫扮演服務贊助其研究經費的跨國企業體時提到，美國加州如果要在全球經濟發揮競爭力，獨尊英語的運動將是自尋死路(suicidal)。見"Wil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urvive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 New Regime of Telecommunications?"

2 根據報導，因全球網民組成的多元化，英語網上的優勢地位正逐漸消失中。

南非，即使是逐漸脫離英語語系殖民的後殖民地地區如馬來西亞，新加坡及政治上非英語殖民的地區，在官方語言或第二外國語言政策的制定上也傾向以英語為首選。英語在歐洲部份地區(如瑞典，荷蘭，丹麥)也成為第一外國語言被重視，英語被認為像數學一樣是一項須學習的基本技巧(Daley, 2001)。即便如標舉著反帝國主義旗幟的中國大陸，也從小學起教授英語，甚至有建議要求大學中三十五歲以下的年輕教授，無論所授何種科目，有四分之一課程要以英語授課(Eoyang, 2000, p. 72)。以臺灣外國語文教育政策在模糊的「以培養具備國際觀的國民，並提升國家競爭力」的目標概念下，也選擇以英語為首要的外國語文，並自90年度起，從國小五，六年級(約10歲，11歲的兒童)全面實施英語教學。

不僅在臺灣，英語學習的確好像成為全球的全民運動。但是當一個國家的人民被要求從基礎小學教育便學習英語，是否因此就一定帶來該國人民在全球經濟體系中有較佳的表現或競爭力，當然需要大量實證性的研究來說明。然而，過早學習第二種語言對學習者心理所可能造成的影響則更需要深入探查。是否每一位學習者都適合學習這項外語，或樂於學習，且學有成效，其實是需要思考的。若以曾經歷英語殖民的亞洲國家，如新加坡，香港，菲律賓及馬來西亞的例子來看，讓孩子過早暴露於非母語的環境，對其在文化認同，社會階層分工認知上所產生的影響是不應漠視的。外國語言學習過程中是否真有所謂關鍵學習階段，而且外國語言學習是否真的越早學習，越容易成功，其實在外國語言學習理論中仍然尚未經證實。因此，相信越早學習外語越好，執意從小學生起推動外語語言(或雙語)教育，相信這樣就能如Crystal(1996)所言降低英語劣勢所產生的焦慮是值得討論的。此外，當英語教育被定位為義務教育的一環，變成為全民基本外語能力的表徵時，表面上，義務教育提供全民均等的學習機會，達到消除城鄉差距的理想，然而，在當前教育資源，師資結構普遍分配不均的狀態下，是否這樣的普及英語教育就能消除因地域所產生且存在的語言學習差距是值得深究的。某方面而言，普遍英語教育的政策思考正如普遍提供電腦教育的思考一般，都期待國民能習得「一技之長」。然而，資訊教育的普及是否便能縮小或

不應漠視的。外國語言學習過程中是否真有所謂關鍵學習階段，而且外國語言學習是否真的越早學習，越容易成功，其實在外國語言學習理論中仍然尚未經證實。因此，相信越早學習外語越好，執意從小學生起推動外語語言(或雙語)教育，相信這樣就能如Crystal(1996)所言降低英語劣勢所產生的焦慮是值得討論的。此外，當英語教育被定位為義務教育的一環，變成為全民基本外語能力的表徵時，表面上，義務教育提供全民均等的學習機會，達到消除城鄉差距的理想，然而，在當前教育資源，師資結構普遍分配不均的狀態下，是否這樣的普及英語教育就能消除因地域所產生且存在的語言學習差距是值得深究的。某方面而言，普遍英語教育的政策思考正如普遍提供電腦教育的思考一般，都期待國民能習得「一技之長」。然而，資訊教育的普及是否便能縮小或消除因科技貧富，知識取得不平等所帶來的差距，研究顯示並非如此。

語言政策落實成效如何涉及學習者語言的態度，使用機會，師資，教材及所獲奧援多寡而異。學習者在學習競逐過程中所投注的時間，成本，也可能因所能接觸到的學習資源及接觸機會而產生效果差異，比如，在積極推動雙語城市政策的台北市³，學習者學習的動機就可能較偏遠地區為強，所得到的資源較優，而在語言學習成效上為佳。在台灣英語全面的推行，常不得不使人質問這樣的政策是否只是強化一般民眾對環繞於英語的迷思或只是滿足都會社會少數跨國菁英人士對英語認知的需求。事實上，在英語並未是官方語言，同時，相較於其他非英語國家，英語平面媒介工具(如英文報紙，雜誌，書刊)並非如此普及，而且在台外籍人士也並非全來自英語系國家的台灣⁴，一般人民於日常生活中實

3 根據 2001 年 2 月 27 日中國時報報導，台北市市長馬英九不滿意一年來到台北市的觀光客只有二百五十萬人次，認為這與國內雙語環境不足有關，正積極以政策改善，「要求北市要有一所小學，一所醫院，一處地政事務所優先辦理全面雙語，以營造雙語環境，吸引觀光客到台北市」見

<http://ctnews.yam.com.tw/realtime/200102/27/71946.htm> 2001/03/1

4 根據中國時報 2000 年 12 月 1 日報導，國安局副局長指出，「目前在外籍人數共有 145 國，45 萬人...外國駐華使領館及代表處 76 個，媒體 59 家。」

性的目的常在是否必須尋求「標準」的理想語言以及體制中是否必須設計種種的評量措施所淡化。此外，過早進行抽離文化情境的語言符號學習，很可能使學習者只淪於成為複製語碼，語音的英語摹擬者，滿足於英語表象的吸納與表現，內化認同表淺的英語文化形式(如好萊塢電影，狄斯奈音樂，芝麻街美語生活)，使其過早臣服於英語文化或媒體的影響而不自知。再者，隨社會工作不同階層的需求，英語必須階層化的情況也勢必衍生。Warschauer (2000)即指出，如旅館清潔工和旅館經理，因工作階層高低不同，所需要的英語層次亦不同，由此從為特殊目標所設計的英語課程中，立即顯現出學習者所接受資訊與教育待遇的不平等，以及學習者之間富有者與非富有者的差異。

對必須自小學階段學習英語的兒童而言，在其母語是否會遭受到干擾及文化認同上是否會帶來困擾都須要進一步觀察研究。不過，隨著多重語言即時自動對話翻譯系統的積極研發，雙語專業人士的訓練，網路資訊，國際會議，航空旅遊等跨國際溝通的場所，一般人民可以藉助翻譯系統(雖然在此方面的研究，離理想成功的翻譯仍然相當遙遠)及具備雙語的專業人士協助進行。即使英語成為許多非英語人士用來溝通的另一種語言，使英語不再是英美等英語國家所專屬的語言時，英語對一般非英語系民眾而言，將變成一種普通的溝通工具，因此在第二外國語言學習上，應該可以不必承載過多必須像英語母語人士一樣表現成功的壓力。此外，依Warschauer(2000)之研究，當英語好像成為國際的溝通語言時，越來越多非英語系國家(如新加坡，馬來西亞，奈及利亞，及菲律賓)，為彰顯其身份與價值，寧願使用經過其變化的英語，以顯現其與過去殖民者標準語言模式的不同(p. 2)。這種抗拒標準語，強調地方性變易英語的情況是否會在臺灣出現當然值得長期觀察與研究。但誠如Warschauer (2000)研究所指，因應這改變中的全球經濟，英語學習和教學是應該有另一種面貌。其中一項必須認清英語使用的現實是，英語用來做為非英語系人士間彼此溝通的工具的機會將大於用於與英語母語人士溝通。但當去英語中心，去英語標準化的聲音在所謂「英語全球化」的時代中不斷出現，英語偏離過去母語人士所認知的標準英語的可能性也

英美等英語國家所專屬的語言時，英語對一般非英語系民眾而言，將變成一種普通的溝通工具，因此在第二外國語言學習上，應該可以不必承載過多必須像英語母語人士一樣表現成功的壓力。此外，依Warschauer(2000)之研究，當英語好像成為國際的溝通語言時，越來越多非英語系國家(如新加坡，馬來西亞，奈及利亞，及菲律賓)，為彰顯其身份與價值，寧願使用經過其變化的英語，以顯現其與過去殖民者標準語言模式的不同(p. 2)。這種抗拒標準語，強調地方性變易英語的情況是否會在臺灣出現當然值得長期觀察與研究。但誠如Warschauer (2000)研究所指，因應這改變中的全球經濟，英語學習和教學是應該有另一種面貌。其中一項必須認清英語使用的現實是，英語用來做為非英語系人士間彼此溝通的工具的機會將大於用於與英語母語人士溝通。但當去英語中心，去英語標準化的聲音在所謂「英語全球化」的時代中不斷出現，英語偏離過去母語人士所認知的標準英語的可能性也將增加。

六·結語：走出獨尊英語的語言文化影響

在認知全球化共通語言的需求及捍衛本土語言文化認同的拉距間，有效的語言政策及計畫便成為平衡二者發展的關鍵。語言學家多主張以發展多元語言的策略對抗英語霸權的現象(Yukio, 1994)。為降低全球語言強弱勢不平衡發展的現象，對雙語或多語的需要應成為全球各國，包括英語系及非英語系國家，共同的體認，而增進平等的互動關係，擴大實質交流，是平衡南北半球，東西雙邊發展的重要舉措。研究英語教育的學者認為，未來英語使用者人口的結構將有所改變，以英語為自身母語以外的另一種語言的人口將遠超過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口(Warschauer, 2000)。語言學家也認知到，英語不再是專屬於十九世紀大不列顛帝國的語言，英語經過帝國解構後，重新因應全球發展需要所建構出的世界性英語(world Englishes)將衍生出多樣的面貌。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無法逃避，也必須面對的是傳統所謂標準正統英語在經過帝國主義時代，離開母土傳播後，所經歷的變易現象。正如生物物種離開母土產生的變種一樣，正統的英語在後殖民地地區，所

及也將僅侷限於小眾。受到全球化的激勵，地區性的語言(**regional language**)將會更受到地區性人民的重視，而某些國家也在政府的贊助下，積極在海外推展該國語言與文化，以不讓英語專美於前，如法國政府斥資數十億法郎在海外推廣法語即為一例。同時類似地區性經貌區的形成，諸如華語，法語等地區性語言將會崛起，以配合地區人民頻繁互動溝通的需求，加速地區性人民在農業，經濟，貿易等方面的發展。**Fishman**更進一步指出，未來在一個國家中以多種語言(**multilingual**)在不同情境場合溝通將是一種常見的現象，英語或許可能仍停留在社會高階層，中間階層(**modest status**)的人民則會偏向使用地區性語言，以希望從地區性互動中獲取較好的成就。因為需要追求科技發展，社會成就而學英語的必要性將降低，而英語會像法語或德語一般式微，但這決不減損今天英語之所以如此傲視全球，普遍傳播背後的價值(p. 1-3)。

為因應目前英語霸權國家為首所創造出的全球單一文化與資本主義經濟需求而一味獨尊英語單一語言，很可能壓縮地區性或世界多元性文化的發展空間與機會。盲目無目標的外國語言教育政策可能無法克竟其功，反而加深因英語傳播所挾帶的文化政治衝擊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內化英語文化價值，思考模式，意識形態為中心標準，矮化或邊緣化英語以外的語言文化而不自知。但如果英語之作為國際共通語言的態勢不變，當英語的學習成為全球越來越多人的功課，英語的學習目標當不應只停留於表相語言符號的學習或表面語言的日常溝通，而是能認知英語未來的演變，擺脫以往以英美為中心的英語標準，更深入全球多元的英語世界，培養文化的自覺，掙脫英語語言文化殖民的窘境，養成能自在進出英語主流的論述世界，挪用，批判，或顛覆其論述的能力。如**Warschauer(2000)**所建議的，認知到英語在全球的地位，使用英語，打破成規，以挑戰語言強弱勢所形成的不平等狀態，也應該是學習的目標之一。

Works Cited

- Ascroft, B, Griffiths, G, Tiffin, H. (1989).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Clayton, Thomas. (1999). Decentering language in world-system inquiry. *Language Problems & Language Planning*, 23.2, 133-156.
- Crystal, David (1997).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ley, Suzanne. (2001). In Europe, some fear national languages are endangered.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6, 2001. Available: <http://www.nytimes.com/2001/04/16/world/16SWIS.htm> 2001/4/16
- "English imperialism: the Japanese have more to gain than lose by learning the language" (2000, April 7). *Asiaweek* 26 (13): 21.
- Eoyang, Eugene Chen. (2000). From the imperial to the empirical: teaching English in Hong Kong. *Profession*, 62-74.
- Fanon, Frantz. (1967). *Black skin, white masks*. Trans. Charles Lam Markman. New York: Grove.
- Featherstone, Mike, ed. (1990).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London: Sage.
- Fishman, Joshua A. Andrew W. Conrad and Alma Rubal-Lopez, ed. (1996) *Post-imperial English: Status change in former British and American colonies, 1940-1990*.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Fishman, Joshua A. (1998) The new linguistic order. *Foreign Policy*. Available: http://www.findarticles.com/cf_0/m1181/113/53590461/print.html 2000/2/10
- Kluser, Randy. Globalization, informatization,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vailable: http://acjouranl.org/holdings/vol3/Iss3/spec_1/Kluser.htm

- Lockard, Joe. (1996). Resisting cyber-English. *Bad Subjects*. Feb. 1996. Available: <http://eserver.org/bs/24/lockard.htm> 10 Jan. 2000.
- McIver, William J. (2000). Motivating a human rights perspective on access to cyberspace: The human right to communicate." *The CPSR Newsletter*.
- Miller, J. Hillis. (1999). Wil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urvive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 new regime of telecommunications?" *The Eighth Quadrenni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R.O.C.* amkang University.
- Newsum, H.E. (1990). *Class, language & education*. Trenton, New Jersey: Africa World Press, Inc.
- Pennycook, Alastair. (1994).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 Pennycook, Alastair. (1998). *English and the discourse of coloni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 Phillipson, Robert. (1992). *Linguistic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P.
- . Review of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Available: <http://www.magi.com/~mfettes/global.htm> 10 Jan. 2000.
- Robertson, Roland. (1992).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 Spichtinger, Daniel. (2000). The spread of English and its appropriation: A global, a European and an Austrian perspective. Available: <http://www.unet.univie.ac.at/~a9504438/dipl.htm> 3 Mar. 2001.
- Tomlinson, John. (1991). *Cultural imperialism*. Baltimore, Maryland: The Johns Hopkins UP.
- Tomlinson, John. (1999).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 Polity.
- Tsuda, Yukio. (2000). The hegemony of English and strategies for linguistic pluralism: Proposing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paradigm. Available: http://www.toda.org/conferences/hugg_hon_papers/y_tsu

[da.html](#)> Jan. 10 2001

Yearly, Steven (1996). *Sociology, environmentalism, globalization*. London: Sage.

Warschauer, Mark. (2000). The changing global economy and the future of English teaching. *TESOL Quarterly*. Available: <<http://www.ill.hawaii.edu/web/faculty/markw/global.htm>> Jan.10 2001

黃宜範 (1993).《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蔡宏明(2000)〈我國中小型企業升級問題及對策〉

<http://www.moea.gov.tw/~ecobook/season/sag3-al.htm>
2001/4/1